

窥见历史的“架上方式”

张大力的“第二历史”



■ 新快报记者 陈煜堃

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在审视，背着运动包的年轻人在凝视，持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在环伺……在这里，如果你把视线从作品转移至诸位看客身上，那么你将把“望、瞰、窥、瞄、觑、探”等等用来形容“看”的姿态都尽收眼底，这一点也不夸张。

然而，眼前并非我们习以为常的街头看热闹，而是发生在美术馆里的一幕，而且还是平日里大多数人深感莫名其妙、嗤之以鼻的一个当代艺术展。

“历史”与“第二历史”

没错，以往艺术展览中罕见的这一幕，就出现在近日于广东美术馆展出的《张大力：第二历史》。展览共展出了艺术家张大力在过去五年里“潜伏”于各大国家媒体机构和档案资料馆，搜寻所得并重新整合的130余组图片作品。

“我把它们从档案馆、旧纸堆中翻检出来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那儿，这并不能够因为我的主观情绪而能改变什么。”张大力说，“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由于孤陋寡闻和某种限制，使大众并不能够了解当时拍摄此照片的历史背景，往往某张图片在后来出现了不同的形式，加之编辑、学者并不深究，后来的人们在按图索骥时就会找错方向，形成了和原本事实既有联系又对其背叛的历史，这就是‘第二历史’。”

于是，就有了观者所见的这些被运用了美化、抹去、添加、拼贴等修改方式的一张张公开的、与事实本来面貌存在差异的历史照片。好比暗房里的“显影”，只是张大力的这道工序出现在了业已曝光的相纸，然而对于在按图索骥时找错了方向的公众来说，它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远比魔术师的障眼法更加叫人不可思议。

采用公众熟悉的图像进行再创作

张大力回忆起，早在很小的时候，他便从父亲口中得知公开出版物上对图片修改这一现象，当时家里的挂历上一张有着周恩来、朱德、毛主席三个人在机场的图片，旁边本应该还有一个刘少奇，而事实上却消失了。

从1930年代到现在，好多照片实际上全部被修改过。比如说有一个照片是鲁迅在厦门，他跟一帮文人照了一张相，鲁迅的前面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躺在前面的草地上，穿了一件西装。发表时没有，那个人是林语堂。最早发表的时候是刚解放的1950

年代，还有后面的版本，几次修改是不一样的。我把这几个版本的照片都找到了。”在张大力收集和整理的这些国人熟悉的历史图片中，我们还发现原来在松树下握手钢枪的雷锋，当时背后的只是普普通通的灌木丛；而同样是雷锋，在一张他做出射击状的照片里，原始角度是俯拍的，而今天广为流传的版本却变成了仰视，于是这个英雄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就更加显得突出和高大了。

还有的照片前后被修来改去数次，其中一张是“毛主席在延安宝塔前走过来，后面有梯田、宝塔、很多种田的人在忙乎”，当张大力将几个风牛马不相干的“结果”呈现在我们眼前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将之形容为“诡异”了：第一次只有毛主席，后面的人没了；第二次修掉了田地，平平的特别干净；最后我收到一张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的，为了表现延安的历史风貌，把人像去掉了，变成了一张风景照片。张大力认为，也许他们还想到那个地方拍照片，可那个地方已经变了，宝塔山底下盖了很多高楼，他们只想要历史原貌，就把原图上的人像给去掉了。

关于“历史”与“第二历史”的博弈，完全可以按照当代艺术的观念方式像架上艺术一样去体现。放眼望去，远的不仅有美国的杜尚给蒙娜丽莎加上了胡子，还有日本森村泰昌对罗丝塞拉比夫人狠“下毒手”；近的就更多了，岳敏君在《消失》中让昔日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从画面中消失，只留下空空如也的一座桥；而王兴伟更是硬生生地把一幅原作中去安源的毛主席换成了自己；还有王广义在《大批判》里屡用不爽的工农兵形象……在中外艺术史里，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图像挪用、替换方式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艺术家大多数是采用了公众熟悉的图像作为再创作的道具，使得观众在最短的时间里便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

的调动上形成知识对位，以达到一种反讽的效果，并迅速被人所感知。

让“真实”变成“连连看”的游戏

是的，在照相术发明之初，就是为了用图片作为现实世界的直观影像，因为“照相机不会骗人”。但人们却忽视了照相机背后的操控者，从主观因素的切入，到暗房技术的支持，“真实”也就开始模棱两可了。

“它是我的创作行为，但是在这个创作里，实际上我并没有动这些图片，是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，让大家观看、观察和思考。艺术创作里有些作品是愉悦人的，有些却是让人思考的，思考完了以后，谁想说什么，谁想得到什么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希望大家家动动脑子，别像猪一样沉浸在温饱的满足里。”张大力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，把历史变成一个“找碴”游戏，让“真实”变成了另一个叫“连连看”的游戏。

他认为这些照片只不过是可视物体的一部分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以及主观愿望和美学观，“当人们今天仔细欣赏和重新审视那些曾经熟悉的图像时，你会感觉到人们对每一张图片的苦心经营，你能摸到历史的脉搏，感觉到他们心脏的跳动。”这就是历史的“架上方式”，仿佛一幅有着某种暧昧和调侃态度的景观，它的美丽与煽情却是建立在一种被学者称之为国家主义的文字、形象再造工程上。

从当初强行闯入公众视野，“暴力”地在公共建筑上进行干预的涂鸦手段，到如今冠冕堂皇走进美术馆，“老谋深算”地让照片自己说话，让受众自觉将思绪延展到历史寓言上来，当中孰是孰非？完成了“物归原位”这一任务的张大力认为那是专家学者和民众的事情，这样一来，“第二历史”作为架上方式也就给公众提供窥见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及新的基点。